

创新与活力

——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下)

文/János Kornai (美国)

转型与技术进步的加速

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后,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对企业家精神、开拓性创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快速传播等敞开了大门。经济基本特征转变为这些国家技术进步的加速创造了条件。

在字里行间我尽量小心翼翼。资本主义有着倾向于企业家精神、创新及活力的内在趋势,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一种天性,仅此而已。它不像是物理定律,必须被赋予实质。前面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创新问题的讨论强调了,除了体制特性这一决定性影响因素外,其他方面也对创新有显著影响。这些非体制特性因素的差异解释了各转型国家创新进程在速度上的不同。企业家精神、创新活动及内在活力通过人类的活动又都重新活跃起来。上述趋势所取得的突破能走多远、能以多快的速度进行,主要取决于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政治及法律环境。它依赖于商业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潜在企业家的勇气、灵感与能力。

新的创新型企业家

让我们从引进革命性新产品的创新开始。第一个例子是在表1伟大的革命性创新中所提及的网络电话

Skype。网络电话的两位发明者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尼可拉斯·詹士庄是瑞典人,乔纳斯·弗里斯是丹麦人。但是将其进行世界范围推广的公司最初却是在爱沙尼亚建立并注册的。因此,根据本文所适用的准则,我们所讨论的是一项爱沙尼亚发明。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的e-Bay花了将近20亿欧元才将其收购,并继续创新进程。

第二个例子匈牙利高科技公司Graphisoft,它可能没有那么著名,但依然值得称赞。发明家兼创新者盖博·博加,某学术研究机构前资深研究员,开发出了一种主要供建筑人员使用的三维立体设计程序(Bojár, 2007)。虽然他的软件在这一领域并非独一无二,但与其他软件相比却显得更加优质、高效,因而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商业成果。博加的公司现在正在对该产品进行世界范围的推广。这是熊彼特式企业家生涯的一个经典例子。两位匈牙利人的命运是如此之悬殊:身处1989年之前的软盘发明者亚诺西未能取得成功,穷困一生并且默默无闻;而Graphisoft的创办者博加在赢得荣誉的同时创造了亿万财富。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从损坏的硬盘里恢复数据的。这个例子也是发生在

卡达尔时代的匈牙利,那个以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著称的年代。当时匈牙利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计算机,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一台计算机坏了,人们一般不会随便丢弃它最重要的部分——硬盘。在对硬盘进行修复后,将它和其他旧部件装配在一起,重新组装成一台电脑是值得的。加洛斯(János)和山多尔·库提(Sándor Kürti)两兄弟掌握了修复硬盘的特殊技巧,并由此萌发了一个创意:如果存储在硬盘上的数据丢失了,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技术将其恢复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丢失电脑上大量信息后的痛苦经历。库提兄弟掌握了那门技术,更准确的说,一门从损坏的硬盘中恢复那些本以为永远丢失了的信息的技能。在1989年之后,这项技术已被应用于市场上。库提兄弟成立了一家公司,用自己的技能又培训出了一些专家。现在他们的客户遍布全球。这是熊彼特式创新者的又一个成功案例。

虽然以上三个例子有两个来自匈牙利,但通过我本人与熟悉这些案例的人士的交往,我深信在其他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同样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不可否认,这种成功的案例目前仍然是屈指可数,后社会主义地区要想出现更多的伟大的创新也尚待

时日。

技术追赶与扩散的加速

后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其私人部门的同时，也建立了市场协调机制。这些国家还通过多种途径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其中包括更快从其他国家引进创新。

过去几十年里，家庭电话在西方国家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电话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且只提供特殊阶层，普通民众要安装电话得等上好几年！中央计划的制定者未考虑优先发展电信事业，对电信部门的资源配置严重不足，最终造成电话线路供给的匮乏。这样看来，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电话服务这种供需失调关系就无

望得到改善。后来，制度发生了变革，电话部门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表5显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每个人都用上了老式的有线电话。此后，一项革命性的新产品——手机出现并迅速占领了电话市场（见表5、6、7和8）^[1]。电信服务以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发展了起来。现在，电话的使用已不受供给的约束，唯一有效的限制来自于需求方。

资本主义与电话服务的充足供给在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因果关系。向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的转变，彻底结束了短缺经济。电信服务得以发展是因为国内外的企业家能够从中获利。手机对有线电话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替代性，使得有线电话业务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地位。恰恰

相反，电话公司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30年前，在苏联或东欧，潜在的顾客为了安上一部电话，需要请求电话公司的关照。而现在，电话公司极力寻求顾客的光临。

而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因为家里没有电话而带来的麻烦。我很感谢后社会主义转型及资本主义，现在不光我家里装了电话，我的亲人们也都有了他们自己的电话。我很感谢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程度的提升。我知道，“感谢”是经济学与政治学词典中所不再使用的词汇。但我想用的正是这个单词，因为它不仅准确地传达了我对资本主义与革新在总体上所呈现出的正面的因果关系、对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特别是电话服务的普及）的理性认识，更体现了我对1989

表5 电话拥有量：比较数据（每千人中拥有电话的人数）

年份	中国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德国	意大利
1979	91	53	53	67	67	308	226
1980	102	58	55	73	70	332	235
1985	167	70	67	88	103	416	314
1990	242	96	86	102	140	441	384
1995	305	210	148	131	169	514	494
2000	353	372	283	174	213	610	536
2005	323	332	307	203	280	661	567

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2009。

表6 欧盟国家的现代通信技术突破

15个老欧盟国家（EU15）与10个新加入欧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之对比（EU10）

指标	单位	组别	2006年		
			EU15	EU10	EU25
GDP	人均，以2000年美元作价	EU15	19,706	23,747	26,781
		EU10	3,469	4,425	6,295
GDP	人均，PPP，以2005年美元作价	EU15	25,321	31,134	35,033
		EU10	9,753	12,286	17,570
个人电脑	每百人	EU15	16	35	37
		EU10	3	12	33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EU15	3	32	64
		EU10	1	11	48
宽带用户	每百人	EU15	NA	2	24
		EU10	NA	0	12
手机用户	每百人	EU15	7	7	16
		EU10	1	40	18

注：数据是每组国家的简单平均。详细数据请参考来源。
来源：世界银行（2008）。

年后所发生的变革的强烈感情。尽管转型有不足也有失败，我仍要由衷地庆祝转型20周年，庆祝资本主义诞生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终于能够拥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所有产品。

表6、7、8列举的其他几类同样重要技术的扩散进程——电脑的使用、因特网的普及等，揭示了同样的结果。向创新国家学习的速度有了极大的提高。

很多企业家以创新者为榜样，结合当地的具体环境将他们的创意加

表7 欧盟国家的现代通信技术突破
5个维谢格拉德国家 (V5) 与3个南欧国家 (S3) 之对比

指标	单位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S3	V5	S3	V5	S3	V5	S3	V5	S3	V5	
GDP	人均, 以2000年美元作价	S3	10,406	11,020	11,847	12,642	13,054	13,623	14,289			
		V5	3,865	4,194	4,435	4,756	5,108	5,635	6,338			
GDP	人均, PPP, 以2005年美元作价	S3	18,620	19,721	21,200	22,618	23,345	24,357	25,545			
		V5	11,550	12,535	13,228	14,176	15,237	16,821	18,956			
个人电脑	每百人	S3	5	7	9	14	15	17	28			
		V5	4	6	9	12	18	23	39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S3	1	3	10	16	26	33	41			
		V5	1	2	6	13	29	39	50			
宽带用户	每百人	S3	NA	NA	0	1	3	8	14			
		V5	NA	NA	0	0	1	5	11			
手机用户	每百人	S3	3	12	40	74	88	100	115			
		V5	1	4	14	46	72	92	113			

注: 数据是每组国家的简单平均。V5包括: 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S3包括: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来源: 世界银行 (2008)。

以应用而取得巨大成功。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就是这类熊彼特式伟大创新者的一个例子。该集团下属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企业间电子商务 (B2B), 特别是小公司间的业务。目前, 阿里巴巴集团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在世界范围内也名列前茅。其创始人及领军者马云, 起初是一名高中老师, 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亿万富翁 (参见 <http://www.alibaba.com> ——公司信息)。阿里巴巴是个极为成功的例子, 后社会主义世界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故事。

总而言之, 最发达国家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差距虽然没有消失, 但已日渐缩小, 这与社会主义时期两者间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鲜明对比^[2]。

创造性毁灭

创新过程是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的动态进程紧密相连的。熊彼特

表8 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现代通信技术突破

指标	单位	2000		2001		2002	
		俄罗斯	巴西	俄罗斯	巴西	俄罗斯	巴西
GDP	人均, USD	俄罗斯	1,618	1,870	2,858		
		巴西	3,611	3,696	4,222		
		墨西哥	4,892	5,864	6,543		
GDP	人均 PPP	俄罗斯	7,853	9,076	13,873		
		巴西	7,727	7,910	9,034		
		墨西哥	9,949	11,927	13,307		
个人电脑	每百人	俄罗斯	2	8	NA		
		巴西	2	6	NA		
		墨西哥	3	7	NA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俄罗斯	0	3	21		
		巴西	0	5	35		
		墨西哥	0	7	23		
宽带用户	每百人	俄罗斯	NA	0	3		
		巴西	NA	0	4		
		墨西哥	NA	0	4		
手机用户	每百人	俄罗斯	0	5	115		
		巴西	1	16	63		
		墨西哥	1	22	63		

来源: 世界银行 (2008)。

将后者称为“创造性毁灭”, 精确而简练地描述了技术快速进步中不可分离的两面。企业 (特别是成功的创新企业) 进入市场固然可喜, 但是没有诸如破产、商业失败、企业退出以及随之而来的下岗和失业等这些

令人悲伤的事情, 就没有迅速的技术进步。转型经济体不幸地经历了两次大的创造性毁灭浪潮。在前期的文章里, 我将第一次创造性毁灭称为转型衰退。那次衰退重创了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 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 并

使过去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过度就业和工作保障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当前这次衰退尚未结束，略带乐观地估计一下不久的将来，产出也许会有所下降，但绝不会像第一次转型衰退期那样严重。那次衰退或许是经济史上最大的衰退之一，但却没有引起人们像这次衰退那样的重视——因为只有我们，也就是前社会主义地区才是转型衰退的受害者，其他国家并没有承受这样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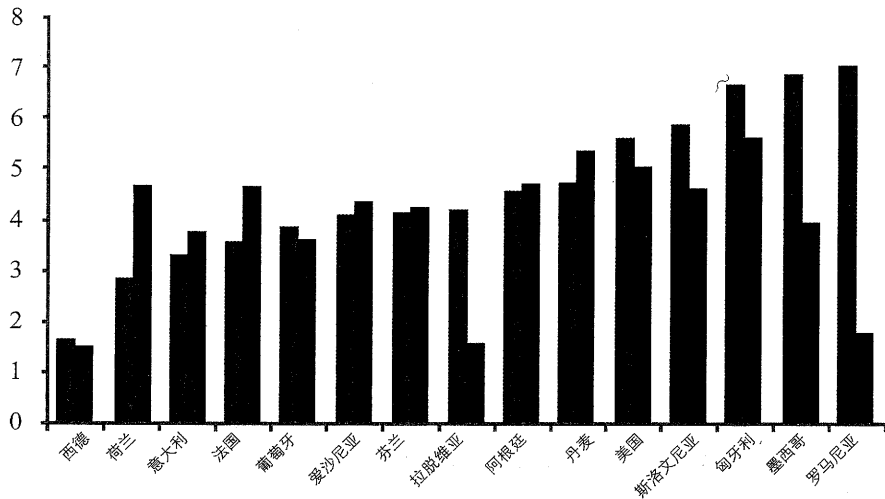
转型衰退带来了可怕而高昂的代价，但也不无裨益。它迫使转型国家快速调整，以应对内外部市场结构的根本改变，也为建立更有活力、更具创新和更高产能的体制扫清了障碍。很多过时的生产线、冒烟和生锈的工厂、货源短缺的商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化的厂房、高科技生产

率)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为3%到8%之间，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转轨经济体中则超过了10%。

由于新创企业流动快速、生命周期相对较短而给市场造成的冲击，后来慢慢平息了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

末期，转型国家中企业数量的相关统计数据，已基本接近于其他国家。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退出比呈现出向均衡比例发展的趋势。红线越来越靠近零点的位置，而零点表明以员工数量为权重的进入退出比正好完全相等。

图2 1990年代公司的进入和退出率



后社会主义国家花费了若干年时间，好不容易渡过了熊彼特进程中最困难的毁灭阶段，开始以不断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并生产出最新的产品组合。但突然间一场新的外部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又一次冲击了该经济。此刻，这个地区的人民正经历着第二次痛苦的经济衰退。可以理解，此刻，“资本主义”一词难以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民众中引起共鸣。

从熊彼特理论来看，目前的衰退除了引发动荡和痛苦外，是否也能起到扫清障碍的效果呢？现在问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这次毁灭是否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日后更好的建设扫清了道路呢？后社会主义今后十几年间的发展将对这一问题做出充分的回答。

关于上面所做积极描述的政策含义，需要另外一篇较长的文章才能说清楚。本文所能做的仅是简述几个可选的政策方案，以及选择这些方案时遇到的两难境地。

1.接受熊彼特关于创造性毁灭的基本观点，并不意味着对于毁灭的所有具体表现都不假思索地予以认同。如果盲目的市场力量导致一家企业破产，那么某些机构（中央或地方政府，金融部门或其他主体）可能会考虑对其实施救助。这里我们遇到了论述软预算约束及道德风险的文献中所涉及的宽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对此问题做过讨论。在此，我补充一点：熊彼特创新过程往往伴随着最有发展前景和最“新潮”部门和子部门的快速增长（还记得大批“.com”公司的问世和成长吧）。这个创新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取得为数不多的巨大成就，就必须启动很多项目；而另一方面，

项目往往启动得太多。接下来就面临“自然选择”的过程了——我们不能为注定要灭亡的物种的生存而战。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会强烈建议对一些企业实施救助。然而，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一下，拯救这些本该被淘汰的企业会产生什么负面效应。

2.关于近期衰退之原因的争论还在继续。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将其归咎于金融部门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强烈呼吁更为严格、更为保守的信贷准则的实施。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熊彼特式创新进程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融资渠道来支持那些有风险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极大地促进技术进步（参见熊彼特式创新必要条件的调查中的D、E两点）。和衰退前相比，人们普遍显得更加谨慎也更加厌恶风险。我承认，现在我们的确需要比以前更加谨慎——但是，如果盲目地采取极其保守的态度来应对衰退，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需要仔细地、有区别地制定信贷标准，以保证那些虽有风险但是前景广阔的创新项目能够获得融资机会。

3.我们听到加强监管的呼吁以及对市场力量约束不够的警告。这些呼吁和警告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超过了这个度，我们就可能会陷入过度监管的境地，行政审批对创业的阻碍，将会浇灭企业家创新的热情。在不少后社会主义国家，创业仍然如同一场艰难的障碍赛[见世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09）的商业活动报告]。政策制定者们要避免两类错误：监管太松，或监管过度（或不当）。

4.很多商人和高管收入的激增令

普通民众感到十分不满。有人呼吁对他们的高收入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这种想法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不过我想给一个不合时宜的提醒：创新成功后的巨额回报是熊彼特式创新过程的必要条件之一（见上述条件B）。注意，是巨额回报！这无疑激励了那些潜在的创新者去承担较大的失败风险。我们需要明确，在本文中，可以称为“创新者”的不光是引进突破性创新的开创者，还包括那些迅速追随国内外开创者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很难想象能有一位正直能干的仲裁者，能在应得与不应得的高奖励之间划出一条合理的界线。我不准备提出一个可行之法，而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高业务收入的完全矛盾的两个方面。

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

基本现象：缺乏理解

在本文的前面部分，我描述了“大转型”（即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我的描述或许会有偏差，但我坚信是基本正确的，因为证据很充足。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这两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映像形成过程。对于前文描述的历史事实，人们是基于他或她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来认知、理解和评价的。

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技术进步。对于过去和未来出现的发明、创新、新产品及新科技，人们是怎么看待的，视其为一种进步还是

一种祸害或威胁?就此问题,我们在19个国家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查;从表9和表10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启示。在技术进步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上,三分之二的波兰和匈牙利受调查者认为技术进步的正面效用要更大。从调查结果看,这两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更为肯定技术进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者的比例要高于奥地利、芬兰、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同样是后社会主义的捷克居民。而当问到技术进步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时,持肯定态度的受访者比例大幅增加。(见表9的第五列,表10的第一列。)

第二个问题不是着眼于评价,而是关于因果关系。我斗胆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大部分后社会主义地区的居民不了解资本主义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过去50到100年的创新,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大多数人享受着技术快速变化的好处,但人们并不把这种改变归功于资本主义^[3]。反而有一大批人存有些许甚至强烈的反资情绪,却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电话、互联网、超市里的商品条形码、塑料制品、合成纤维、现代家居设备以及复印机等,无一例外都是由他们所鄙视或讨厌的资本主义制度赐予的。

遗憾的是,那仅仅只能是个推测,因为我无法找到任何独立调查、民意测验或价值调查来支持、修正或推翻此推测。在助手的帮助下,我试着仔细查阅了各种最权威的调查^[4],却发现:在对被调查者所提的上百个或多或少与此相关的问题中,没有人以任何形式问过这样的问题:你怎样

看待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

除非得到第一手调查数据,而该数据又能够揭示人们心中对此问题的真实看法,且能得出结论迫使我修正这一推测,否则我会维持刚才的推测。调查的缺乏似乎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间接地支持了我的推测。如果专门研究如何认识社会变革及民众对变革的态度的研究人员都完全忽略了这

一类问题——我们还能期望普通民众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如此重要的问题就没人开展过相关调查,这清楚地表明,对于思考政治和经济领域与技术进步加速之间的关系,人们漠不关心。

舆论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形成的。父母、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我们的邻居及同事,都是此进程的参与者。我想评价一下那些对舆论形成负有特殊责任的人群。

表9 技术进步的价值(百分比)

国家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奥地利	82	71	71	33	48
芬兰	89	77	77	21	50
意大利	82	73	76	50	57
西班牙	79	66	73	37	57
波兰	89	93	83	45	65
匈牙利	94	81	79	34	63
捷克	85	71	70	35	44

注:题目是:“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此表反映了所有受访者中持肯定观点的人数比例。

来源:欧洲晴雨表调查(2005)。

表10 对新技术所产生的影响的期望(百分比)

国家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比利时	47	90	85	63	77	67	90	79
法国	72	84	87	64	81	70	86	79
德国	75	95	89	65	75	57	92	72
英国	82	91	92	65	81	61	90	80
匈牙利	82	87	87	74	78	67	81	75
波兰	91	89	92	63	86	80	88	88
罗马尼亚	83	78	86	65	82	75	84	85

注:题目是:“你是否认为以下新技术会带来正面、至少是中性的作用?”此表反映了持肯定答案的人数比例。

来源:欧洲晴雨表调查(2005)。

经济学界的责任

我们教了什么东西给学生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熊彼特的启发，增长理论产生了令人激动的重要的新进展，并且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这种赞同经常流露在彬彬有礼的脚注中，但它对主流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还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资本主义的优点时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最近的代表人物们不懈地强调市场自发力量的创新本质。研究比较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及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们专注于探究制度特性和技术进步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大量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却没教给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们这些有价值的思想。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但很有说服力的试验：我们查一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入门课本。以曼昆（2001）写的教材为例，它在美国是最常用的教材之一，也被翻译成其他若干种文字，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被作为教材。这是一本经典的教材，对重要的观点都展开了有趣的阐述。但是，书上却找不到对熊彼特创新过程的任何叙述，连一句话也没有。书后索引里的数十个人名中，也没有熊彼特。书中倒是对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有些苍白无力的论述，但既没有生动描述创新过程，也没有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这个缺憾无法弥补。

在我的研究助理Judit Hürkecz的帮助下，我们还查阅了五本在美国、欧洲（包括匈牙利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6]）更为流行的教科书。结果同样令人失望，我们对曼昆教材的上述评价同样适用于这五本书。

我不想匆忙下结论，因为肯定会

有重要的例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和熊彼特观点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学者（以及其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持相似观点的人）正在教授微观经济学，他们肯定不会忽视对创新过程的解释，也不会忘记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在激发开创性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那五本书的例子并不具有代表性。囿于本人精力和本文篇幅有限，我无法分析太多数量的代表性教科书以得出恰当的结论。但是除非遭到实质性的反驳，否则我将维持先前的假设：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极端重要的制度特性，大部分（可能占主导地位）高等教育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阐述。

主流经济学经常被人诟病为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经济学。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可真够失败的，竟然遗漏了对这个制度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具有永不停歇地大规模创新的倾向——的阐述。

GDP已经成为衡量增长的主要指标。对GDP给出一个全球统一的可操作的定义和衡量方法，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一大贡献。但如果人们仅仅用这个指标来评价经济成功还是失败，那就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了。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GDP的增长率上，忽略了其他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指标：如通货膨胀，财政平衡，经常账户，社会平等程度等。然而，对于本文中的技术进步，至今还没有公认的指标来度量其成功或失败以及加速或放缓。在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GDP在1994年到2000年左右才恢复到1990年前夕的水平，事实上，在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恢复进

程更慢，有的甚至至今还低于那个水平。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得到彻底改变。在本文中，我说的改变不仅限于政治环境、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状况的改变，除了这些非常重要的改变之外，我还指由资本主义创新过程创造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在这些国家的迅速应用。我们抱怨GDP的低水平——但不要忘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与外界相通，更多的人用上了汽车和现代家居设备，也使用着许多之前只属于西方世界的其他新产品。我们应该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以公允、合理地表现出技术进步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经济学家及经济统计学家都意识到需要完善对GDP的核算，通过与其他指标相结合来综合反映福利与社会发展等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正采取一些重要的新的手段，以改进对增长的测算，将总产出数据和反映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等情况的指标结合起来分析^[6]。我担心本文所强调的——技术进步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会再一次被忽视，而未得到其应受的重视。

政治家的责任

不言自明，政治家们负责政府政策的制定。前面的分析能否在政策上得以体现，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决策。但是此刻，我想对政治活动的另一方面做些评价。政治领袖也是一国的教育者。在我的助手Tibor Meszmann及几位住在匈牙利外的同事的帮助下，我们参阅了以下国家的政治领袖所作的一些公开演说：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及斯洛文尼亚。我们选取的政治领袖是这些国家的总统、首相或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党领袖。我们尽量选取了反映一国成功与失败(例如美国的国情咨文)的演说或公告,这类演说或公告多在重大节假日或重大事件期间公布。我们所分析的文本大多是在2009年的前8个月中所公布的,我们还偶然找到了一篇庆祝1989年大转变20周年的演说,该演说对后社会主义转型作出了整体的评价^[7]。

总体而言,在53篇演说或公告中,没有一篇谈及资本主义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这一优点从未被详加阐述,以说服人们相信: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充满创新、现代化以及活力的世界。

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演说中谈及技术进步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作用,但没有进行具体解释。通过对这53份演说的分析,我们深感震惊和失望。我们选取的政治领袖不是反资的极右派或极左派,而是代表东欧政治“根基”(establishment)的领导者。他们交替执政或成为反对派,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而是朋友——然而,他们却没有找准力挺资本主义的最佳论点。

我们补充一点,极少的政治领袖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往往都强调制度的阴暗面,并对其公开批评。

当然,我们应该参考更多的政治演讲或书面声明。我需要任何新的材料,包括反例,即那些强调资本主义在催生创新上的作用以及将技术进步的加快视为转型成就的演讲。但是,只

要还没被驳倒,我将坚持我的观点:因为疏于对“资本主义→创新→改变生活方式”这个因果关系进行阐释,朝野各界的政治家们都应该对此负有重大的责任。理解了这个关键的联系,就能有效地驳斥反资观念——而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显然失职了。

当然,这可能是一时之失。最使我恼火的是那些反资的民粹主义者——他们一边享用着资本主义催生的发现或创新,一边却煽动人们反资。那些政治活动分子使用着个人电脑、手机和通过卫星或光纤提供的通信渠道,来鼓动人们参加反资集会,参加抗议游行。对此,我极其反感。后社会主义地区正在出现这样的情景:那些对社会制度已经改变这个基本事实甚至都加以否认的政治活动家们,在博客和网站上打出他们民粹主义的反资口号,通过扩音器向大众发表煽动性的言论,通过手机来互相联系,殊不知他们自己使用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科技。

网络互联和民主

人们心目中究竟怎样理解和评价“资本主义→创新→生活方式改变”这个因果联系?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逆向思考一下,即思考技术进步(更具体地说,信息通信领域的进步)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治观点的影响,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关于后社会主义的受访者对民主、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表11、12和13总结了调查的数据。在表格中,我们把人群分为两类:经常上网的与不经常上网的。其差别相当显著。相比之下,那些与现代IT技术紧密相连的人,更加赞同资本主义和民主,对过

去的政体也更加不满。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互联网的使用者对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太多怀念之情,但这种恋旧之情在有些人心中却日渐强烈,尤其是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上面所述的实证结果较好地吻合了另一组关于“网络互联”的研究结果。顾名思义,互联是指个体间通过各种技术设备和手段而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方面E-mail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给他人发送E-mail的人越多,这一连络网络就越紧密。这一现象既可观测也可计量。

我在这里主要参考了Christopher R. Kedzie (1995) 的很好的论文。他用公制(metric)对互联进行了计量。因为我本人并非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无法判断在Kedzie的研究中,使用公制是否为所能采取的最佳办法。在有条件地接受了他的方法后,他研究的基本结果自然就值得一提了。除了其他方面的计算外,他还分析了“民主”(由多指标加以度量)与“网络互联”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其相关性为0.73,比民主与人均GDP的相关性(0.57)要强。由于缺乏互联指数的计算过程中所涉及领域的相关知识,在介绍这一命题时我有所保留。Frisch (2003) 近年的研究支持了Kedzie的结论。希望这一方向的研究能够继续。

此刻,我重提前面所论述过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在肢解共产党及正统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力量中发挥的作用。前面我所研究的是20年前在前苏联及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但其说明的问题并未过时。有两个小国——古巴及朝鲜,其经济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强权的共产主义专政依然存在。还有两个大国

表11 对民主的满意度

按是否使用互联网对人群进行划分

国家	互联网用户		非互联网用户	
	平均值	百分比	平均值	百分比
中东欧	2.6	30	2.8	70
捷克共和国	2.5	42	2.8	58
匈牙利	2.2	23	2.4	77
波兰	2.7	34	2.9	66
俄罗斯	3.0	14	3.1	86
斯洛文尼亚	2.2	57	2.1	43

注：百分比表示互联网用户或非互联网用户在该国所占比例。问题是：“你对民主的运转有多满意？”答案被分为4个等级：1=完全满意；2=比较满意；3=不太满意；4=完全不满意。此表反映了结果的平均值（未加权）。

*对于匈牙利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结果，我持保留意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据显得过低了。（JK）

来源：（略）。

表12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评价

按是否使用互联网对人群进行划分

国家	互联网用户		非互联网用户	
	平均值	百分比	平均值	百分比
中东欧	1.9	30	0.4	70
捷克共和国	2.5	42	0.7	58
匈牙利	0.7	23	0.5	77
波兰	1.4	34	0.9	66
俄罗斯	0.9	14	0.8	86
斯洛文尼亚	1.6	57	0.7	43

注：百分比表示互联网用户或非互联网用户在该国所占比例。问题是：“你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多满意？”答案从-10分到0分，再到10分，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中性，再到非常满意。（未加权）

*对于匈牙利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结果，我持保留意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据显得过低了。（JK）

来源：（略）。

表13 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评价

按是否使用互联网对人群进行划分

国家	互联网用户		非互联网用户	
	平均值	百分比	平均值	百分比
中东欧	1.1	30	3.2	70
捷克共和国	2.6	42	0.6	58
匈牙利	0.3	23	3.0	77
波兰	0.4	34	3.4	66
俄罗斯	1.6	14	4.4	86
斯洛文尼亚	3.0	57	4.0	43

注：百分比表示互联网用户或非互联网用户在该国所占比例。问题是：“你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多满意？”答案从-10分到0分，再到10分，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中性，再到非常满意。（未加权）

*对于匈牙利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结果，我持保留意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据显得过低了。（JK）

来源：（略）。

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其经济基本接近于资本主义，但其政体却没发生什么变化，依然是一党专政。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这些国家又有些什么影响呢？中国和越南渴望充分利用技术进步革命性成果所带来的所有益处，但同时也担心其潜在的影响。领导层的两大目标——最大化技术进步的收益，同时最大化对垄断权力的保护——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因此，两国的领导层首鼠两端，进退两难。

另一个值得分析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进步的前景：即将来临的创新浪潮和生活方式之间将会有怎样的相互影响？

悲观时，我会预见各种坏的场景。无须预测未来的特殊才能，我们也很容易就能预计到，有些技术成果可能会被不当使用。我读过几篇报告，是关于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政治审查，还封杀了几家视频网络并关闭了一些言论不当的博客^[8]。既然中国使用的电脑越来越国产化，那么很容易强迫企业在新电脑的操作系统里安装能够集中控制的审查软件。遗憾的是，西方国家的大厂商因害怕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竟乐意配合当地官员引入这项政治审查软件。

60年前，当奥威尔写《1984》这本书的时候，“老大哥”还不拥有小说中所设想的那种装置。但现在，在每幢公寓和办公室安装摄像头或窃听装置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难度。想象一下未来的“斯大林”用最新的监控和通讯装置监控所有人的情景吧！

乐观时，我就会摆脱那种噩梦般的设想。我希望，无论独裁者怎么集中权力，现代科技都能引领我

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分散。如果独裁者发明一种新的封锁信息的方法,也会有成百上千的分权主义者(decentralizators)和有发明才能的电脑用户冲破其信息封锁和壁垒^[9]。

结语

我的文章涉及了很多话题。我没打算将研究局限在某个或某两个主题上。我们所探讨的,是本应绚烂多彩的比较经济学与后社会主义“转型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大片空白区域。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一空白区域予以概述。

对于与本文几个论题相关的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某些成果在本文中有所提及。但问题在于,每一个主题都有其独立的庞大的文献体系,而这些课题彼此之间却完全独立,未曾互相援引。链接是现代通讯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和关键技术手段(一般是加下划线的蓝体字,以帮助我们

从一处文本跳到下一处),很不幸,对后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舆论、技术、信息通讯等方面变革的研究,彼此之间并没有有效地链接在一起。我建议建立它们之间的链接——这样,各领域的学人也许能从中得到新的重大启示。我没有在本文中插入真正的链接供大家点击——但我至少试着激发大家的想象力去思考应该在哪儿置入链接。我的重点不是给出某个链接的具体描述或分析,而是希望大家对研究课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个总体印象。

还有很多在本文中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涉及的主题,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实证观察和理论分析。对技术进步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在不同层面上仍在继续着。本文所讨论的观点只是定位于其中的一个层面,我很清楚在我研究的这个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相关的层面^[10]。

我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有着充沛的精力对这一空白领域进行细致

的探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而又富有挑战的研究课题啊!希望我的文章能够激励他人进入这一未被研究的领域。无论如何,我将继续研究制度的政治经济维度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关简介: János Kornai,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吴文韬、连洪亮翻译。本文发表于UNU-WIDER“转型的反思:柏林墙推倒20周年纪念”国际会议上。在此,特向Julian Cooper, Zsuzsa Dániel, Zsolt Fekete, Thomas Geodecki, Philip Hanson, Jerzy Hausner, Judit Hürkecz, László Karvalics, Zdenek Kudrna, Mihály Laki, Lukasz Mamica, Tibor Meszmann, Dániel Róna, András Simonovits, Katalin Szabó及Chenggang Xu致谢,感谢他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他们在收集数据和资料方面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长期的支持及其提供的激励性研究环境,以及Hédi Erdős, Rita Fancsovits, Katalin Lévyayné Deseő, Anna Patkós, Ildikó Pető, Andrea Reményi和László Tóth在编辑本文时给予的帮助。)

注释

[1] 在某些国家,例如匈牙利,这不仅阻止了有线电话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事实上在很多家庭中手机已经取代了有线电话。

[2] 根据综合反映“资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资讯社会指标],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Karvalics, 2009)。这些国家的排名在不断提升,各指标得分也逐年提高,要知道,仅维持现有排名就需要很大的努力。

[3] 在前面的部分,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电话线路的供给不足和1989年之后的过量供应时,我个人对此现象有个评论:感谢资本主义给我生活带来的变化。也许我不是唯一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但我担心,有这种想法的人只占少数。

[4] 我们查阅了四个最著名的跨国调查,寻找上面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却未能找到任何与上述问题内容相似

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已被记录,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5] 这些教科书的书名,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6] 法国西米共和国总统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由Joseph Stiglitz, Anantvar Sen及Jean-Paul Fitoussi负责,对增长与发展的测量方法提出新的改进意见,目前他们正在撰写报告的初稿。

[7] 如需相关文本的具体清单,请与作者联系。

[8] 见Chao (2009)和Timmer (2009)关于中国加强政治审查的工作。要了解大体情况,请在维基百科上输入Internet censorship词条查看。

[9] 在前面的脚注中,我提到了Timmer发布在网上的文章,编辑向我征求对该文的意见,这是我的第一条评论,怎么阻止中国人格式化硬盘和安装盗版Windows软件?

[10] 我简单的介绍几个本文所未提及的维度:

——新信息技术对个人、社会群体、居住地、国家或州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高科技信息通信与单一民族国家及其国际化有何关系?

——资本主义的未来,新信息时代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基本属性发生剧变,是否会诞生一种不能再称为资本主义的新体制?(两位匈牙利经济学家Katalin Szabó和Balázs Hámóni在2006年写了本有趣的书,副标题叫:数字资本主义还是新经济制度?还可参见Haug (2005))

——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如何影响了商业(特别是金融部门)的运行模式?

——新信息时代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有何启示?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向: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哲学层面上重新思考我们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生产技术与人类互动方式的变革在影响社会机制及政府职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領導者 LEADERS



「親筆」書中闡述我面臨挑戰、
東亞安全形勢和中國的國際地位、
計劃如何看日本外島、
建設中國經濟、
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與各國關係的處理。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